

[SUFU-IAR-201102]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2011 年度政策研究报告之二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陆 丁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加拿大菲沙河谷大学终身教授

2010 年 12 月初稿/2011 年 7 月修订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提要】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然而，这一成就，完全可以用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加以解释，其中一些特殊有利条件，也未必是中国体制特别优越的结果。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高储蓄率推动高投资率，以低廉劳动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透支来推动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在中国成功地加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原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因素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三十年来的增长方式必然会随之发生转变。

根据其它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验，通过以内需取代外需从而使出口导向型的高速增长转为贸易平衡型的中速增长，应当是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化的方向。中国要发挥本身的潜力和优势，抓住城市化和人口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机遇，成功地应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在体制上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和改革：进一步建设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保障个人的平等权利和机会，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改革政府功能，加强其社会保障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服务功能，减少其介入商务运作的干预功能；避免政府和官员卷入商务利益，用法治、舆论和民意来监督约束公权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全民的长远福利。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面临的挑战 调整与改革

目录

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和成就	1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	6
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	8

- ◇ 进一步建设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
- ◇ 保障个人的平等权利和机会，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
- ◇ 改革政府功能，加强其社会保障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服务功能，减少其介入商务运作的干预功能
- ◇ 避免政府和官员卷入商务利益，用法治、舆论和民意来监督约束公权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全民的长远福利

图表一览

表一 中国经济规模的赶超历程.....	1
表二 过去三个十年中经济总体年均增长率超过 5% 的经济体.....	8
图一 中国人均 GDP 在三十年间从低收入国家行列上升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
图二 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的国际比较.....	4
图三 环境破坏的估计值以及占 GDP 的比重	5
图四 中国的人口负担比率和 15-64 岁的人口	5
图六 中国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基尼指数.....	7
图六 日本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相当美国经济总额的比重	9
图七 日本和美国的人口负担比率.....	10
图八 老龄负担比率（中国、日本、印度、美国）	11
图九 人口年龄中位数（中国、日本、印度、美国）	11
图十 城市化程度（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国）	13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陆丁

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和成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令举世瞩目。如此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持续三十年以年均将近百分之十的高速增长，每七年多经济规模翻一番，累计增长十七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高速经济成长，使中国国力大增，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三十三年前的 1978 年，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名列十一，只相当于美国经济的百分之八。如今，中国 GDP 按市场汇率计算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以上，按购买力平价则相当于百分之六十以上。2000 年赶超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 年超过英法两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 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 年又取代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时至今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大出口贸易大国，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在接下来十到二十年内内在总体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登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已经成为中外舆论的普遍预期。

高速经济成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尽管收入不均两极化，经济成长仍然使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三十年间增长了十二倍，从只有世界平均收入的十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使中国在 2008 年正式摘掉了低收入国家的帽子，提升为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图一）。

中国这三十多年经济崛起的成就常常被人们称为“奇迹”，有些媒体和学者也据此强调“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其实，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的高速增长，完全可以用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加以解释，其中一些特殊有利条件，未必是体制特别优越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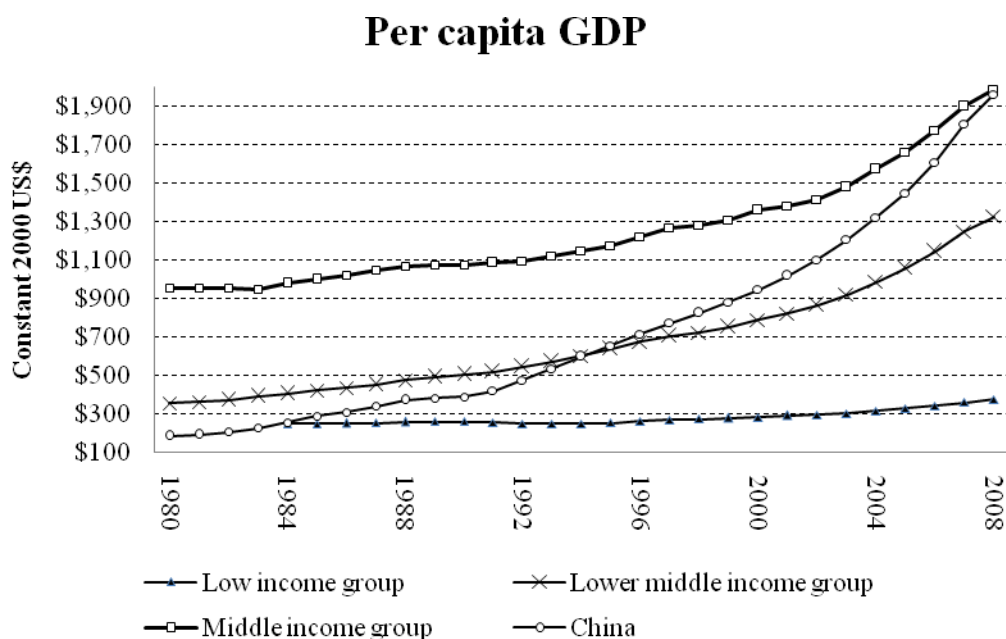
表一 中国经济规模的赶超历程

年份	世界排名	相当美国经济的	超越国家
1978	11 位	< 8%	
2000	6 位	12.04%	意大利
2005	4 位	17.53%	英国、法国
2008	3 位	26.68%	德国
2010	2 位	31.35%	日本

* 本报告根据作者在首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2010 年 12 月）发表的论文修订而成。

Note: Economic size is measured by Gross National Income, Atlas method (current US\$). The percentage for 2010 is estimated.

Source: World Bank.¹



图一 中国人均 GDP 在三十年间从低收入国家行列上升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首先，中国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实施、九十年代初全面展开的市场化改革。现代制度学派的 North (1990) 等学者早就论证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意义²。近年来，实证派发展经济学家进一步从地理历史文化的角度，考证了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在经济落后国家移植引进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提供基本法制秩序和公共产品的有效国家治理环境以及商品交易的历史传统和地理条件³。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

¹ World Bank (201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database, <http://data.worldbank.org>.

² North, Douglas,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³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lsevier, North Holland, 2005; Acemoglu, Daron and Simon Johnson, "Unbundling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5): 949-995. 2005; Dani Rodrik,

在近代与西方文明交往冲突之前，就已经具有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传统和通商四海的地理条件。中国也有延绵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和地方治理兼有的官僚治理体制。所以，一旦引进了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体制，促发较快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必然的。中国近代史上，五口通商后租界经济的繁华、同治中兴年代官民实业的快速崛起、以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蓬勃，都是例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中，就有三个是华人为主的经济体，另一个经济体韩国也和中华文化血缘深厚。其他后起的亚洲小虎经济中，华人企业也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大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实行了将近三十年的中央计划体制、压抑消灭民营经济，一旦改弦易辙，搞市场经济，自然重新激起经济活力。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回归中国曾经拥有的、世界各国通用的市场经济体制，谈不上什么特有的模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学界在围绕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转轨方式和成效的论战中，早已探讨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起飞的特殊条件⁴，其中包括：

- 起点低的半工业化经济，使得中国可以在工业化的同时调整经济结构，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继续保持经济较快的成长；同时也让百姓在普遍贫困的起点上较为明显地感受到经济改革的成果。
-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备战备荒”和政治动荡，打乱削弱了“条条”（中央计划）、增强了“块块”（地方自给自足），形成了“小而全”“大而全”的“地方诸侯”经济，客观上有利于改革开放后各地经济的多样化竞争和发展。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在贸易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开放和中国的技术文化交流，这是所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没有的外部条件。
- 香港和澳门长期作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成为中国联系世界市场的特有门户，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有中央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一旦中国试办特区，尝试改革开放，大量港澳资本迅即流入。而八十年代末，台湾当局开放台胞探亲，又导致台商资本进军大陆的热潮。此外，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华商资本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Arvind Subramanian and Francesco Trebbi,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Integration and Geograph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MF Working Paper*, WP/02/189.

⁴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 Jeffrey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994): 101-45; Woo, Wing Thye. “A United Front for the Common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 Case of 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 Wu vs. Woo”, *Issues & Studies*, 39(2) (2003): 1-23.

以上这些导致中国经济成功起飞和高速增长的因素，都和本身体制的特殊性无关。如果要找和体制有关的因素，以下这几项可以讨论。

- 人力资本超前：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力资本学派早就论证了人口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家根据现代医学研究成果，从营养水平和传染病对儿童智商影响的角度，进一步实证分析了贫困疾病和劳动生产力低下的关系。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人力资本指标，如识字率、预期寿命等，都超前达到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图二）。这对促成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有重大的作用。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人力资本的超前发展，显然得益于长期实行的全民初等教育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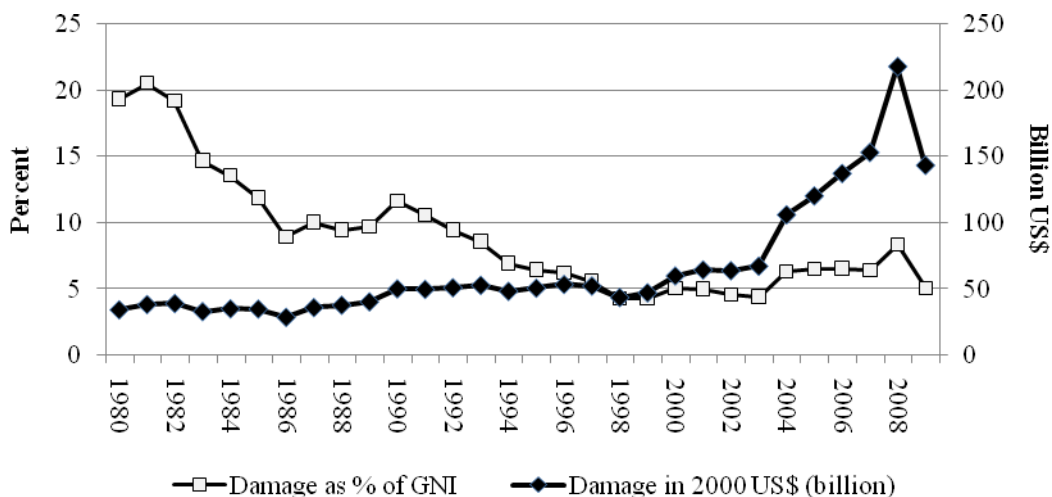
图二 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口局。

- 资源环境透支：在环境经济学中，有所谓“环保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的规律，即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早期工业化往往给资源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和浪费；环境保护和治理只有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才会得到实施。许多研究表明，中国这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环境资源代价是高昂的。仅就水资源而言，据 E. Economy（2007）的记载⁵，中国 660 个城市中，三分之二水资源短缺，110 个城市严重缺水。由于大量抽取地下水，上海、天津等最富庶的城市都面临令人焦虑的地面沉降问题：1990-2004 年期间沉降超过 1.8 米。百分之九十以上城市的地下水受污染，四分之三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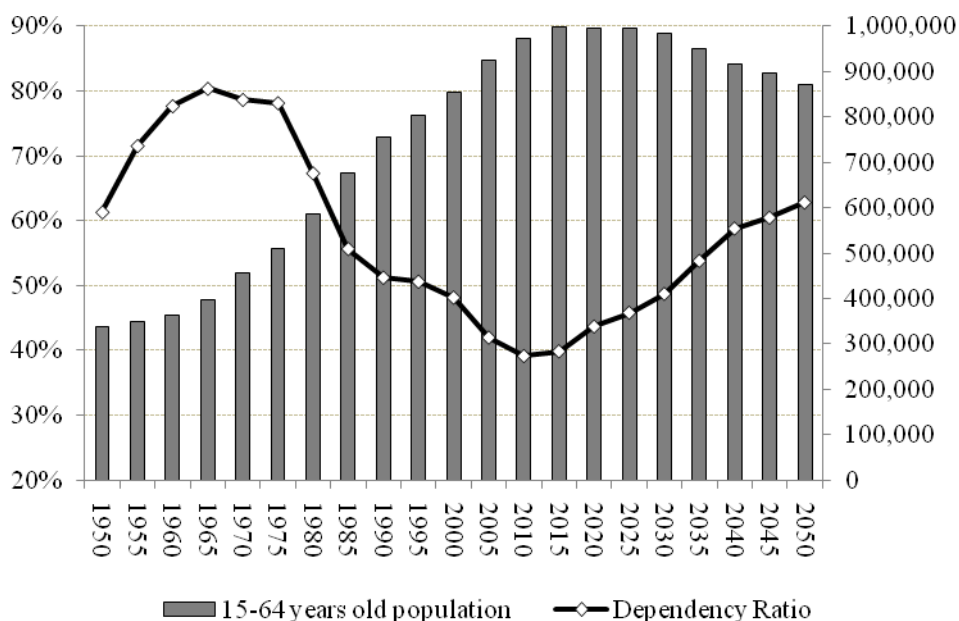
⁵ Economy, Elizabeth C. “The Great Leap Backward? The Cost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Foreign Affairs*, Sep/Oct 2007. 86(5): 38.

市区域的河流不适合饮用。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环境破坏的损失在 2008 年估计高达 2000 亿美元，占 GDP 百分之八以上（图三）。这些环境资源透支，显然是这些年来 GDP 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但也预示将来治理的沉重负担。



图三 环境破坏的估计值以及占 GDP 的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四 中国的人口负担比率和 15-64 岁的人口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局

- 集中发生的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结构在过去六十年间，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重大变化。从 1949 到 1970 年，由于高出生率和下降的死亡率，人口迅速增长，造成人口抚养比例的上升。第二阶段始于 1970 年代，国家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推行，进而在 1980 年代演进为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出生率急剧下降，婴儿潮中出生的世代长大成人，陆续加入劳动人口，劳动人口增长持续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使得工作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长期上升，导致人口抚养比例连续三十多年下降。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是这期间中国储蓄率高、劳动力供给充沛、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重要原因，十分有利于中国经济在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实现起飞。（图四）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中国这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模式主要特征是：**以高储蓄率推动高投资率，以低廉劳动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透支来推动出口导向型的增长。**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

然而，在中国成功地加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原来支持经济高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三十年来的增长方式因此必然会发生转变。

首先，人口红利已经耗尽，人口结构正发生逆转。如图四所示，总人口抚养比已经延续下降了三十年，在 2005-2015 年间达到谷底，同时老年抚养比打破维持多年的 10% 的上限，即将开始长期攀升。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少儿抚养比将继续下降到 2015 年左右，然后会保持基本稳定。老年抚养比的持续上升和少儿抚养比的有限度下降，于是会使总人口抚养比在 2015 年后开始攀升，在 2030 年回复到 1985 年的水平。根据经济学中储蓄的生命周期原理，人口抚养比的攀升，必然将会渐渐降低储蓄率，改变多年来中国高投资率的基础。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也将显著改变中国建立在丰沛劳动力资源基础上的比较利益优势，而这正是中国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主的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中国 15-64 岁劳动人口将在 2015 年达到最大值（9.98 亿）之后开始下降。随着人口老化，劳动队伍的平均年龄也会逐年上升。根据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劳动队伍老化对劳动生产力的负面影响，需要以更快的技术创新进步来弥补，否则很难扭转生产力增长的颓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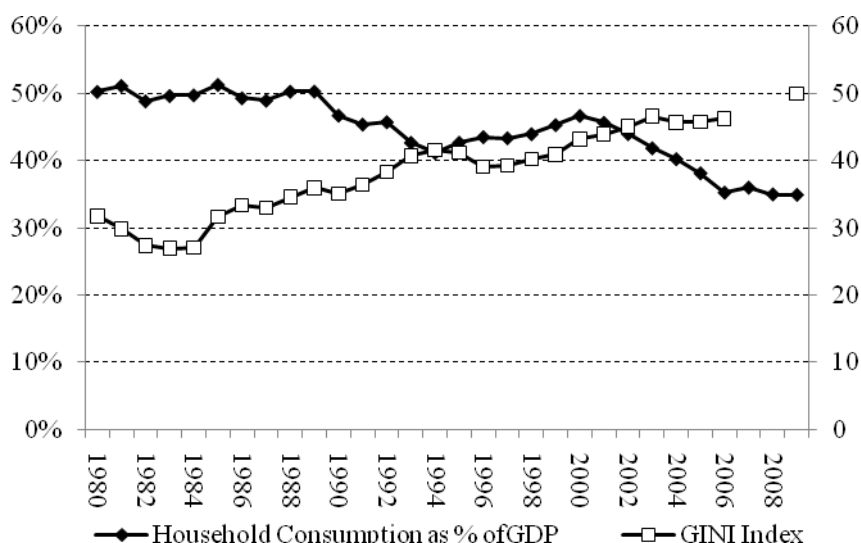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资源环境的制约必将越来越突出。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报道⁶，目前仅因水资源匮乏和污染每年减少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 2.3%。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环境保护意识必然增强，过去资源环境的透支，要由环境治理的庞大开支来

⁶ John Grimond, “For want of a drink: a special report on water”, *The Economist*, May 20, 2010.

偿还。况且，中国在总体经济规模还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按购买力平价是后者的三分之二），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第一大国。从全球经济来看，这种资源环境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也难以继了。

再次，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也面临外部市场条件的制约。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以低价的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结合高储蓄基础上的高投资，以出口导向带动制造业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在多年经常项目顺差的基础上，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实现了经济实力的提升，美国等西方富国则不但通过跨国企业获得高额利润、还享受到借中国人的钱来购买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的好处，似乎“两全其美”。

然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以及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已经迫使西方各国着手改革负债经济结构。同时，那些年龄结构还年轻、人口负担比率还在继续下降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必将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市场显现出日益显著的比较优势。对于中国而言，继续以廉价劳动为别人打工，并不合乎长远的国民福利。在中国社会层面，这样的增长方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多年来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下降、收入不均持续扩大的局面，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见图五）。



图六 中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基尼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Chen Jiandong, D. Dai, M. Pu, W. Hou, and Q. Feng. The trend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China, BWPI Working Paper 109, Jan 2010, Manchester.

根据国际经济学中的 Balassa-Samuelson 效应，全球（贸易收支结构）再平衡过程应当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中国出口产业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必然带高国内其他行业的要素价格尤其是工

资水平。即使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迟缓升值，其实质汇率也会因为国内劳动成本的增加而升值。在国际资金流动较为自由的条件下，如果国内货币政策相对地偏紧（特别是目前美日等国在零利率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更会刺激资金流入，增加国内金融货币市场流动性，迫升人民币汇率或国内价格，加速这一调整过程。

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

由上述分析可知，通过以内需取代外需从而使出口导向型高速增长转为贸易平衡型的中速增长，应当是未来十到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化的方向。我们也可以从过去数十年间其它国家的经验看出这一趋势。

根据中国 2008 年的人均 GDP 水平（按 Atlas 法计算为 2940 美元，相当 2000 年原值美元 2940），我们收集了 1980 年代初、1990 年代初、2000 年代初的所有人均 GDP 达到或超过这个水平的经济体的总体增长数据。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为了体现可比性，我们以 2008 这年的五百万人口规模即全球人口的 0.075% 作为较早年代的经济体选取标准。

表二 过去三个十年中经济总体年均增长率超过 5% 的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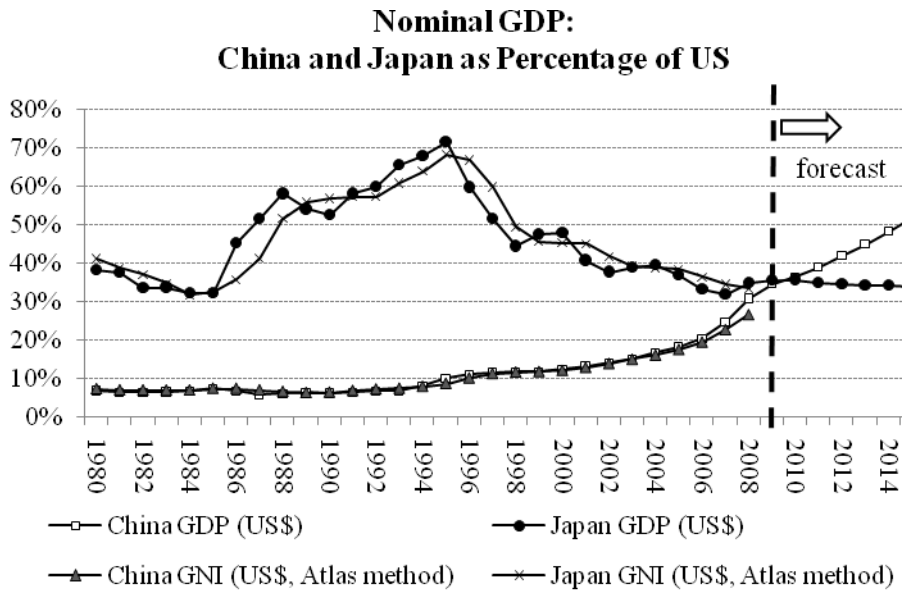
参照标准	人均 GDP (2008)	人口 (2008)	GDP 年均增长率 (2010-25, 世界银行预测)	老龄人口负担比率 (2015, UNPD 预测)
中国	1,965	1,262,645,000	8.10	13.21
1980-1989 (34 个经济体)	人均 GDP (1980-82)	人口 (1980)	GDP 年均增长率 (1980-89)	老龄人口负担比率 (1980-89)
香港	12,474	5,063,100	7.43	10.64
南韩	3,526	38,124,000	7.68	6.57
马来西亚	1,997	13,763,441	5.88	6.40
1990-1999 (38 个经济体)	人均 GDP (1990-92)	人口 (1990)	GDP 年增长率 (1990-99)	老龄人口负担比率 (1990-99)
以色列	15,541	4,660,000	5.54	15.91
南韩	7,403	42,869,000	6.25	8.27
智利	3,301	13,190,515	6.38	10.34
马来西亚	2,779	18,103,341	7.25	6.18
2000-2008 (41 个经济体)	人均 GDP (2000-02)	人口 (2000)	GDP 年增长率 (2000-08)	老龄人口负担比率 (2000-08)
斯洛伐克	5,541	5,388,741	5.69	16.38
马来西亚	4,031	23,273,615	5.49	6.63
多米尼克	2,759	8,829,829	5.33	8.91
秘鲁	2,056	26,004,162	5.60	8.46

Note: A “comparable economy” had a population no smaller than 0.075%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reviewed decade and had an average per capita GDP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the

decade that was no less than China's level in 2008 in constant year 2000 US\$.
Source: World Bank, IMF.

在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到，仅有 7 个经济体在这 3 个十年中在连续十年或更长时间内取得过超过 5% 年均增长率。其中，只有马来西亚能够在所有 3 个十年中都达到这样的高速增长，南韩能够在 2 个十年里达到这样的增速。只有 3 个经济体——香港、南韩和马来西亚能在连续十年取得年均 7% 以上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 3 个经济体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曾经拥有比中国在未来十年更年轻的人口结构，也就是更低的老齡人口负担比率。尤其是马来西亚，在这 3 个十年代初的老齡人口比率只有 6.4%-6.6%，仅仅相当于中国 2015 年老齡人口比率一半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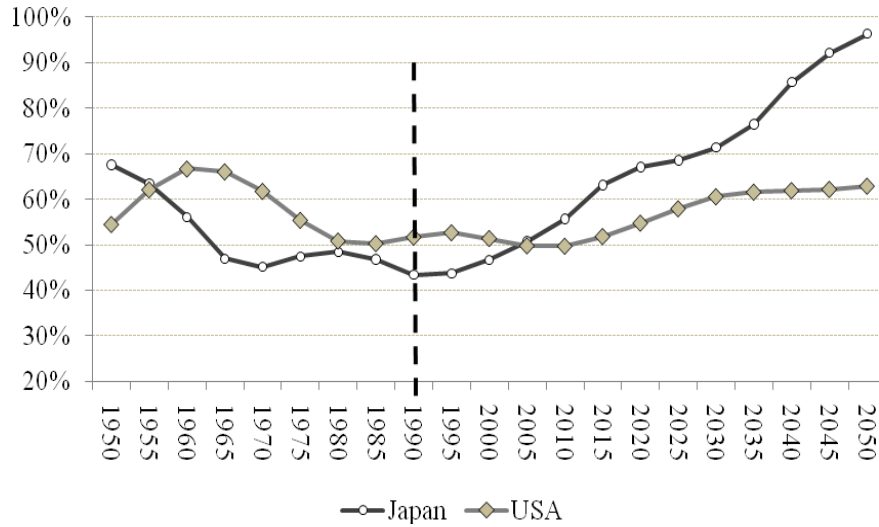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化的路径上，另一个亚洲经济大国日本的经验教训是应当汲取的。如图六显示，日本经济总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赶超美国的势头似乎很足，曾一度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 70% 左右。但自那时以来，赶超趋势却发生逆转，日本经济增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步履缓慢，停滞不前，如今日本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了。



Source: World Bank & IMF.

图六 日本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相当美国经济总额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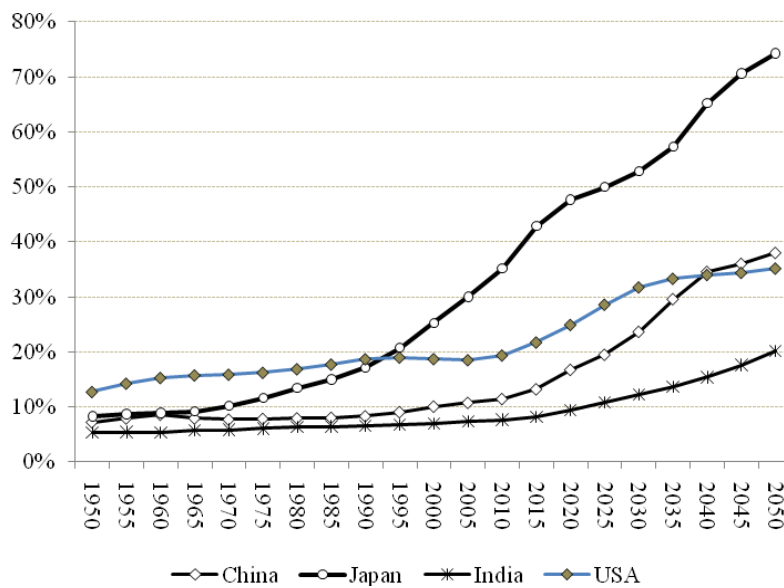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图七 日本和美国的人口负担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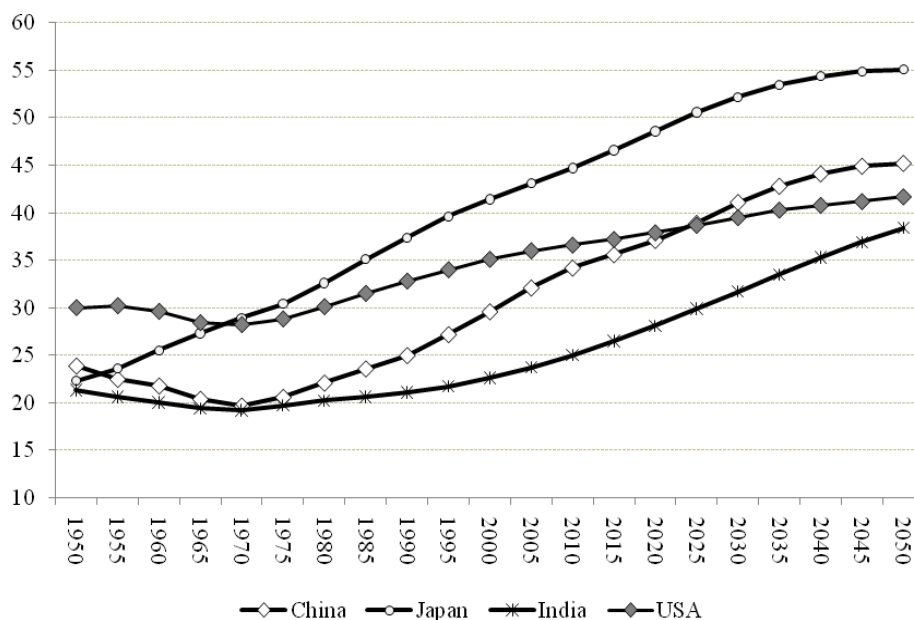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局

在导致日本经济滑坡的众多因素中，人口结构老化可能是最重要的。从图七和图八可以看到，日本大约在 1990-1995 年间耗尽了人口红利，人口负担比率在到达最低点后开始攀升。也是在这个时期，日本老龄负担比率超过了美国的水平，并由此开始明显拉大了和美国的差距。在 1970 年以后，日本的中位数年龄也开始超过美国，两国间中位数年龄的差距在 1995 年超过了 5 岁，到 2010 年，则超过了 8 岁。和美国相比，日本的劳动队伍变得越来越暮气沉沉（图九）。



图八 老龄负担比率（中国、日本、印度、美国）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局



图九 人口年龄中位数（中国、日本、印度、美国）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局

与日本相比，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也不容乐观。图八显示，中国老龄负担比率在 2025 年将达到日本 1995 年的水平。而中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将在 2020 年超过日本 1990 年的水平，并在 2025 年和美国的中位数年龄并驾齐驱。

那么，中国经济能不能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呢？

应当看到，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衰落自有一些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失当之处。首先，日本的社会保障体制虽然较早就实现了全民覆盖，但由于其 pay-as-you-go（现收现付）的性质，在计算支付额上又对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过于乐观，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在人口老龄化后不堪负担，造成了现今日本公债高筑的后果（目前，政府公债总额几乎是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也挤掉了更具经济促进力的公共投资。

其二，日本许多大企业曾对全职员工实行终身雇佣制、并普遍实行年功序列薪金制。这样的体制也加重了人口老化对经济的负担。因为在该体制下，年轻员工的工薪报酬往往低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年长员工的工薪则高于边际生产率。当劳动队伍普遍年轻时，这些日本企业的劳动

成本低，竞争力强盛。而当员工年龄老化时，它们的劳动成本则迅速上升，严重影响企业竞争力。结果迫使许多骨干企业向海外转移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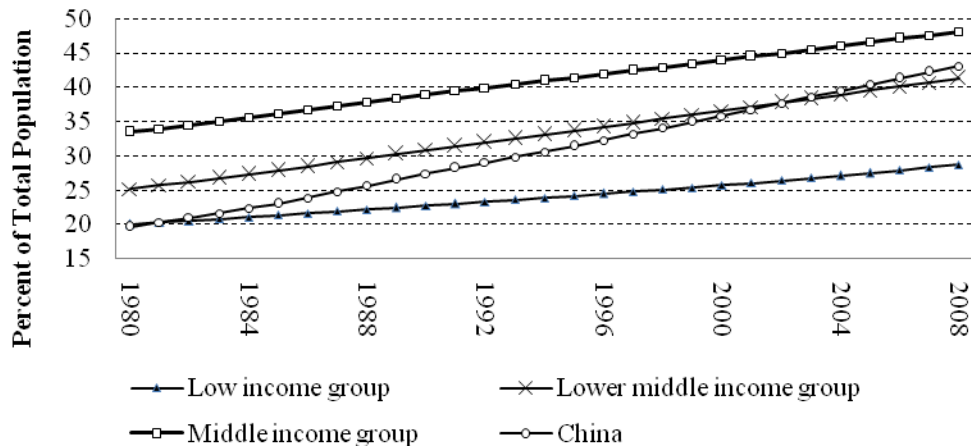
其三，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多如牛毛，缺乏规模经济，也缺乏竞争机制。许多大学里，教授论资排辈，固步自封。企业和高校研究开发联系薄弱，人才交流渠道狭窄，创新环境暗淡。在基础教育方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为了改变刻板僵化的教学方式，日本政府文部省盲目模仿美式教育，实行所谓“宽松教育”改革，严重降低中小学基础教学要求，却仍然无法改变青少年厌学风气。本来，日本中小学英语教育就很薄弱，实行“宽松教育”后，竟然更进一步遭到削弱。教育事业的落后，使得日本劳动队伍老龄化得不到生产力提升上的补偿，终于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停滞。

最后，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政府未能采取果断措施，使银行体系多年被坏账拖累，经济陷入通缩困境，使得失业和半失业问题长期化，萧条停滞成为常态，降低了长期增长的潜力和活力。

以上这些覆辙，有些属于日本特有的体制特征，有些属于政策失误，中国都可以小心避免。相比而言，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增长潜力。

- **依然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从图四可见，中国 15-64 岁年龄段的人口规模要到 2025 年以后才会明显下降。在这之前，劳动力总量仍然是充沛的。不过，15-24 岁年龄段的青年劳动力会较快较显著地减少。
- **超前积累的人力资本。**图二显示，中国在成人识字率和平均预期寿命这些指标上都明显高于其它中等收入国家。这些指标所反映的人力资本优势，在今后还会继续有利于劳动生产力的提升。
- **滞后的城市化。**对比图一和图十，可以看到中国虽然在人均收入上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在城市化程度上却仍然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至少五个百分点。这说明城市化将继续推动经济增长。
- **中产阶级的崛起。**如图五所显示，基尼指数自 1990 年来上升了 12 个百分点，贫富悬殊明显扩大。如果收入分配结构能够有所改善，中等收入阶层可以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Urban Population



图十 城市化程度（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国）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不过，上述几方面的增长潜力必须把握得当才能够得到发挥。充沛的劳动力必须在蓬勃的就业市场上才能得到充分就业；超前积累的人力资本也要在具有创新活力的竞争机制中得到发挥；城市化只有在农村居民进城工作定居的体制障碍解除后才可持续；中产阶级的崛起，需要有机会更公平的市场条件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才可发生。而且，中国也面临着一些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日本更为棘手的挑战：

- **未富先老：**当年日本人口红利耗尽的时候，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和当时美国相当的水平。而中国现在人均收入还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作为一个刚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大国，在十多年后就要承受日本九十年代初的人口老化程度，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 **环境资源限制：**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迄今为止资源粗放型的增长不仅达到了本国资源环境的极限，也受制于全球资源环境的限制。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必然会要求清还过去对环境资源透支的欠帐，加强环境治理。
- **社保体制欠完善：**日本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初步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尽管后来这个体制需要许多改革来持续。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在城市居民中才建立不到十年，在农村则刚刚起步。而且还存在地方分割、缺乏全国统筹以及基金管理混乱、个人帐户空转等一系列缺陷。
- **社会分配既不均也不公：**由于“社会资本主义”的体制加上高额的遗产税制度，日本高速经济发展年代伴随着较为均等的财富收入分配，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中均富增长的特例。而

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却是在官僚权力广泛介入市场运作的体制下发生的，导致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钱权交易以权贵资本主义的方式进一步深化，财富和收入更为两极化的分配。种种体制因素（如户口制度）造成弱势群体（如农民工）在竞争机会上遭受不平等待遇，难以实现康富梦想。

- **全能型的政府体制：**虽然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曾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起过一些作用，但在各级政府民选、私有财产权受法律充分保障、官员权力受法治限制的条件下，政府的主要功能仍然是公共服务型的。在中国的政体下，各级政府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的考核绩效，公权力过度介入商务运作，涉及到政府以及官员本身太多的经济利益，形成广泛干预市场运作的全能型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资源环境保护、社会保障、老龄服务等课题很容易被忽略。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论，中国要发挥本身的潜力和优势，抓住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机遇，促成中产阶级的崛起，成功地应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在体制上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和改革：转变政府功能，加强其社会保障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服务功能，减少其介入商务运作的干预功能；避免政府和官员卷入商务利益，用法治、舆论和民意来监督约束公权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全民的长远福利。进一步建设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保障产权契约，改善经商环境；以改革土地制度为杠杆，逐步取消城乡户籍分割，推动农村人口城市化；落实全民义务教育，保障个人的平等权利和机会；确保公平竞争，提升有利民间创新创业的市场氛围；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在税制和社会福利保障方面促进中老年就业机会。